

# 试析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局限性

潘桂仙

(柳州师范高等学校 政史系, 广西 柳州 545003)

**摘要:** 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是由雅典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其实质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 即使是民主政治高度发展时代, 在民主政治实行的范围、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础等方面, 仍有较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 伯里克利时代; 民主政治; 公民; 提洛同盟

**中图分类号:** K54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20(1999)04-0105-04

从公元前443—429年, 伯里克利连续十五年任十将军委员会首席将军, 成为雅典大权独揽的最高统治者, 史称“伯里克利时代”。马克思曾说: “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sup>[1]</sup>。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民主政治使雅典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 国家强盛, 然而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不是广义上的民主, 更不是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

雅典民主制是狭隘的民主制, 雅典民主政治的狭隘性突出表现为民主政治在十分狭小范围内实行。

发达的民主政治对公民身份实行严格限制。在古代雅典, 国家政权即城邦权力归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 它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城邦一切大事。而在古代希腊城邦,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 “Polites”为属于城邦的人, 即“公民”。<sup>[2]</sup>经济上, 土地所有权是公民权的重要保障; 政治上,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参与城邦政治管理, “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sup>[3]</sup>军事上, 公民是城邦的战士。总之, 公民是一个与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具有本质区别的阶级或阶层, 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公民拥有公民权, 而其他阶级或阶层则没有。也正因为如此, 雅典法律对公民身份的认定十分严格, 伯里克利时代, 一方面使奴隶主政治民主化, 另一方面却对公民身份作严格限制。前451年, 雅典公民大会根据伯里克利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公民权法。法律规定, 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者才能成为雅典公民, 享受公民权利。据此, 占人口多数的妇女, 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

以及被释放的奴隶都不能享受民主权利, 有公民权的只有雅典自由民中的成年男子。据哈蒙德的《希腊史》估计, 公元前431年, 雅典的全部人口约40万人, 其中奴隶约20万人, 自由民16万8千人, 其余为外邦人。按法律规定, 奴隶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 这样, 23万多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在剩下的16万8千自由民中, 还要排除全体妇女, 有公民权并能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有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 这部分公民大约有4万人, 仅占雅典居民人数的1/10。这说明, 雅典城邦公民并非指全体成年居民, 它只包括少数的阶级或阶层。

有效行使民主权利的只是极少数富有奴隶主。以上提到, 在公元前431年, 有公民称号可以享受民主权利的人约为4万人, 那么这4万有资格的公民是否都去参政呢? 雅典的民主制度给所有公民提供了直接参政的平等机会, 官员任期的限制和抽签轮流制原则保障了最大限度的民众参预问题, 城邦实施给予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以补贴保证了贫穷公民能参加公民大会。这一切似乎可以认为, 绝大部分的公民都积极地参预了城邦的民主政治生活。可是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在公民中积极参政有效行使民主权利的也是少数。以公民大会出席人数为例, 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 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力参加, 公民通过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一切大事。学者推算, 雅典成年男性多时达4万人(公元前431年), 少时也有2万5千人(公元前4世纪)<sup>[4]</sup>, 学者普遍认为雅典城邦中, 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约在6千—8千人之间<sup>[5]</sup>。其依据是: 一、雅典法律规定, 公民大会部分有效票数是6千张票; 二、雅典公民大会的会

场能容纳6千5百人,前340年扩建后可容纳8千人。另有学者认为此数字估计过高,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也许还不到6千人,因此才有最少票数的限制。至于影响公民参加大会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阿提卡半岛许多地区离雅典较远,因而部分公民由于交通不便而不愿出席公民大会;也有学者认为伯里克利时代虽给予下层公民参加公民大会时一点津贴,但每月所得仅相当于手工业者平均工资2/3,实际上无法养家,且广大从事小块土地生产的农民不顾农时,每隔十天去参加一次在雅典城举行的公民大会是不可能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交通不便可能阻止居于偏僻地区的公民出席大会,但这只是少部分;农民虽大多时候因生计而辛勤耕作,但也不是没空闲时间,且古雅典公共节日多,农民却有时间参加公共节日的活动。因而上两种观点是片面的认识。在此,我们暂且抛开谁的结论更接近历史真实,以现有资料看,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无论是在6千—8千人之间,还是不足6千人;也无论影响公民出席大会的原因是那样或那样,不可改变的是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其所占的公民总人数的比例是极少数的,远远不及公民人数的多数,无论讨论的问题多么重大。因此,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有效行使民主权利的只有少数富有的奴隶主。

财产私有制局限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雅典,城邦的经济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因此公民财产的不平等势必影响他们政治上的不平等。尽管在古代雅典,由于种种原因,私有财产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不同于古罗马或古代东方那么明显与直接,个人财富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但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里,无论其影响与作用的程度如何有限与间接,富人阶层都会因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取得种种特权。这种财产的等级制度从梭伦时代起,一直存在于雅典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国家一切公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国家公职的任职资格也不再是门第与财富,而仅是年龄和性别。为使贫民也能参政,雅典还对公职人员实行津贴制,薪金全部由国家发放。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雅典的奴隶主们之所以让一些公民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在经济上得到一些津贴,正是因为需要这些公民,需要利用他们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对内镇压奴隶,对外镇压盟国,并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sup>[6]</sup>其二,伯里克利时代,绝大部分的公职是无津贴的,特别是国家最高公职——十将军没有津贴,这就让普通的公民即使当选也无力担任。在雅典,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伯里克利,连任十五年首席将军,在十余年间,伯里克利几乎独揽全国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修昔底德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sup>[7]</sup>伯里克利权势之大在雅典历

代当政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在雅典,财富如何影响民主政治?最主要方式是政治领袖不惜耗费巨资即捐助,来取得公民政治上的支持,由于雅典城邦对其公民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不课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有公民以捐助方式承担,捐助项目包括维持三层桨战船费用、戏剧演出费用等等。这种捐助只有少数富有公民有能力承担,普通公民则是难以支撑的。在雅典,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积极参预捐助,如著名将军西蒙,“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sup>[8]</sup>在“感激”观念十分突出的雅典民众中,政治家们正是通过捐助来赢得民众的感激之心,进而利用这种感激心理取得公民们政治上的支持。可能各个政治家借以获取公众感激的手段各异,但其中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财富,财富之所以影响雅典的民主政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财产的私有制。可以说,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财产私有制与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根本局限所在。

## 二

雅典民主政治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阶级社会里,“纯粹的民主”、“完全的民主”和“超阶级的民主”根本不存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排斥妇女、剥夺奴隶和奴役盟邦基础之上。

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妇女政治权利剥夺基础上。同其它许多传统社会一样,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主宰的社会,或者说是男性社会,在城邦中,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体是男性公民,妇女地位低下,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号称古典政治之最佳的雅典,恰在被誉为民主政治“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时期,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甚至不及其行民主制之前,也不如同时期的其它国家。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诸如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无缘,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其时,尽管雅典的妇女是雅典共同体的一员,但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倍受歧视。民主政治时代前,妇女尚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随着民主政治确立,妇女的权益日益下降,她们与侨民、奴隶一样,对其所在的城邦来说是局外人,是被统治者,被排斥于公民生活之外,伯里克利时期,公民大会讲坛向全体公民开放,每个公民可竞相登场,发表宏论。然而这并不包括妇女,她们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当然也无从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投票,妇女是被政治遗忘的群体。雅典对妇女的要求是文雅、谦恭、寡欲。民主政治的热情倡导者伯里克利就曾认为,最大的荣誉属于那不被男人评头品足,谈褒论贬的女人<sup>[9]</sup>。亚里斯多德甚至谈到:“如果妇女的地位未经好好规定,那么半个公民团体就欠缺法度。”<sup>[10]</sup>即只有严格限制妇女,奴隶制城邦才不“欠缺法度”。民主政治正是基于这种严厉排除异性的思想为指导,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使雅典

变成以男性公民为中心的社会,一切政治生活都是在占人口极少数的男性公民中进行的。因此,伯里克利鼓吹雅典民主政治“自由公开”也只是针对男性公民而言。

伯里克利时代,妇女地位之低下既有人为的社会因素,也有传统和历史的原因。同时这种民主本身无广泛性而言巩固了男子的地位,决定了法律不会对妇女的基本权益提供任何保障,她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并不比奴隶多。雅典法律规定,妇女无权继承遗产,无权签约,不得在法庭起诉作证,无权立遗嘱,凡妇女影响之下的民事活动,均无法律效力等等。诸如此类法律条文不胜枚举,而且这些条文恰恰出现在民主政治“黄金时代”,它说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一切法律条文体现的是男子的意志,法律赋予男子的是民主和自由,而赋予妇女的则是屈辱和服从。在法律的制约下,雅典妇女终身都得在男人的庇护下,永无出头之日。在家从父,嫁人从夫。若未婚丧父,其父的继承人便是其保护人。所有重大事务,要由她的父亲、丈夫或者其他男性亲属做她的保护人。全权公民所获得的一切,她都得通过其保护人获得。这使妇女们不得不叹息:“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中,我们女人算最不幸的。”<sup>[11]</sup>总之,民主政治时代是整个雅典对妇女歧视、漠视、排斥的时代。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政治从来都是带有阶级性的,但带有浓厚的性别特征的民主则是罕见的。本质上反映了这种民主建立在包括对广大妇女在内的大多数人进行压迫的基础上。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范围之有限,竟然连同属本阶级的妇女都容纳不下,表明民主政治发达的结果只能使妇女地位更低下,对妇女政治权利剥夺基础上的民主,是男人的民主。雅典妇女的境遇是伯里克利民主政治局局限性的真实写照。

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的残酷剥削之上的。希腊的奴隶制有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开俄斯型。雅典的奴隶制属于开俄斯型。这种类型的奴隶来自外部买来的非希腊人,用于多方面的劳动,主要为自由公民所私有,自希波战争后期起,希腊的开俄斯型奴隶制有很大发展,因为希波战争给奴役外族奴隶提供了重要条件,如公元前467年攸里密顿河口之役,雅典俘获2万名波斯俘虏,全部卖为奴隶。据估计,公元前431年雅典的全部人口约40万,其中雅典自由民16.8万人,外邦人3.2万人,奴隶20万人<sup>[12]</sup>。雅典的奴隶广泛应用于手工业方面。小的手工作坊一般使用5—10个左右的奴隶,较大的作坊使用30—100多个奴隶。使用奴隶最多和最集中的地方是矿山。构成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劳里昂银矿有一万多名奴隶。雅典一个大富豪尼亚曾把一千多奴隶出租给矿山,有的自耕农也占有一两个奴隶。奴隶根本不被当人看待,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奴隶是一种有生命的财产,有生命的工具。”<sup>[13]</sup>正是奴隶劳动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给雅典经济带来空前繁荣,为民主政治繁荣奠定经济基

础,为雅典公民参加政治活动,行使民主权利提供重要保障。例如雅典对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支付的津贴,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来自劳里昂银矿的收入,这是靠剥削和压榨奴隶的血汗所得。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奴隶主最大限度地加强对奴隶的剥削,在矿山里劳动的奴隶更悲惨,他们日夜在矿坑中劳动,大批地死亡。雅典能有一些公民领着津贴行使民主权利,正是因为还有更多的奴隶被剥夺公民权在为他们辛勤的劳动。因此,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剥削和压榨奴隶基础之上,是工商业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

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役盟邦基础之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繁荣同样离不开对其他盟国的奴役和专制统治。在希波战争后期,为进一步消灭波斯的海上势力,雅典与爱琴海岛屿,小亚细亚海岸的许多希腊城邦结成新的同盟,史称“雅典海上同盟”,又称“提洛同盟”。参加同盟各邦在原则上一律平等,但自同盟组成之日起,因为雅典拥有舰队的数量“超过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海军优势决定雅典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它管理同盟金库,统帅同盟的海军,它在同盟会议上的发言具有最后裁决的效力。”<sup>[14]</sup>因此雅典在同盟国中是十足的霸主,它对盟国的奴役主要表现为经济的攫取和政治的控制。

为了使雅典四万公民都有资本投入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伯里克利除加强国内经济建设,还十分重视从同盟中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雅典对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支付的津贴,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掠夺盟邦劳动人民血汗的同盟金库。由于同盟年金的开支悉由雅典决定,这样盟国的年金也就成了雅典一项重要收入。伯里克利把两百多个盟邦分为五个纳贡金,每隔四年调整一次贡金数额,贡金最多时,一年可达600塔兰特,占雅典全年财政总收入一半以上。这笔资金除发展庞大的海军舰队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从政津贴都可从中任意挪用。加盟各邦稍有不满,立即遭到雅典的军事制裁。武力保障了雅典从盟邦中获取巨大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雅典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经济来源。如果将政府从同盟年金收入数额与公职津贴的发放数额作一换算,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点。以同盟年金为400塔兰特计算,(修昔底德认为,同盟贡金原为460塔兰特,后增为平均每年600塔兰特),1塔兰特为3.6万奥波尔,即1440万奥波尔。五百人会议议员领受最高津贴,每日5奥波尔,年金不过1800多奥波尔;执政官4奥波尔,年金为1440奥波尔,陪审员2奥波尔,年金为7200奥波尔。据当时的物价,一个成年男子的消费每日约为2奥波尔,粗略计算,提洛同盟年金400塔兰特可提供的公职津贴包括五百人会议议员、执政官、驻外使节、巡回法官、陪审员、水手等在内的各类公务人员达2万人<sup>[15]</sup>。不难看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离不开对盟邦金库的掠夺。

与经济掠夺并行的是政治上的控制。伯里克利要

求同盟各邦一律以雅典为榜样,必须建立民主政体,从而在希波战争后期,许多城邦相继建立起民主政体,使盟邦与雅典在政治上协调一致,盟邦所有的官吏和公民,都必须向雅典宣誓效忠,否则将被剥夺公民权。伯里克利对盟国所施行的权威,说明了他所讲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对盟国的仁慈和宽容,这种民主体现的是对盟国的奴役,即经济上占有,政治上专制,军事上高压,它使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自由,反映了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又一局限。

### 三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看,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产物,存在许多弊端。伯里克利时代,国家公职人员产生方式有三种:1、十将军委员会,由10个部落分别用举手方式各选一名将军组成,每年改选一次,可连任。2、执政官,先由各部落分别提出候选人,然后在候选人中抽签选出9名执政官,任期一年。3、一般执政官、议事会成员、公民法庭陪审员,都由30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可以

看出,除象将军一类的军事职务和有关财务的职务是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外,其余机构多是由抽签方式选举。抽签选举的盛行,构成了雅典民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公民以抽签和轮流方式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这种粗鄙的平均主义平等思想,很生动地反映了雅典民主的原始性和局限性。

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民主是从奴隶制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受奴隶制的发展所制约。这里的平等观只是要求公民之间的平等,而且是公民在某些方面的绝对平等,同时它又为维护公民和非公民间的不平等服务,公民平等的思想是与只有高贵者才能担任公职和管理国家的思想相对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种轮流执政的思想毕竟是与劳动分工的不发达和国家事务的相对简单情况紧密相连。况且,抽签选举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它强调的不是被选者的条件,而是公民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平等权利。这很容易将一些庸才和并非代表人民公意的人选入政府,从而有碍于国家的治理。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1979. 113.
- [2][3]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中译本[M]. 商务印书馆, 1983. 110, 113.
- [4][5] 黄洋.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J]. 世界历史[京], 1994, (1).
- [6] 刘家和. 世界上古史[M].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257.
- [7]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M]. 商务印书馆, 1978. 65.
- [8] 亚里斯多德. 雅典政制[M], 商务印书馆, 1978. 27.
- [9]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商务印书馆, 1978. 136.
- [10]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M]. 商务印书馆, 1983. 83.
- [11] 西方思想宝库[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59.
- [12][13] 米襄. 世界上古中古史·上册[M]. 高教出版社: 177, 179.
- [14] 吴于廑.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5. 56.
- [15] 顾颉斋. 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形成[J]. 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 梁文杰)